



华章经管

【美】乔治·吉尔德 (George Gilder) 著

(原书第2版)

林民旺 李翠英 译

重获企业精神

将枯燥无味的商业与
经济学烹制成一道文学大餐

★
Spirit
Recapturing
the Spirit of Enterprise
2nd Edition



机械工业出版社
China Machine Press

【美】乔治·吉尔德 (George Gilder) 著

(原书第2版)

林民旺 李翠英 译

重拾企业精神

★
Spirit
Recapturing
the Spirit of Enterprise
2 n d E d i t i o n



机械工业出版社
China Machine Press

George Gilder. Recapturing the Spirit of Enterprise, 2nd Edition
Copyright©1992 by George Gilder.
Chinese (Simplified Characters only) Trade Paperback Copyright©2007 by China
Machine Press.

This edition arranged with Georges Borchardt, Inc.(The Borchardt Agency) through
Big Apple Tuttle-Mori Agency, Inc., Labuan, Malaysia.

No part of this book may be reproduced or transmitted in any form or by any means,
electronic or mechanical, including photocopying, recording or any information storage and
retrieval system, without permission, in writing, from the publisher.

All rights reserved.

本书中文简体字版由Georges Borchardt, Inc.(The Borchardt Agency)通过Big Apple
Tuttle-Mori Agency, Inc.授权机械工业出版社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独家出版发行。未经
出版者书面许可，不得以任何方式抄袭、复制或节录本书中的任何部分。

版权所有，侵权必究

本法律法律顾问 北京市展达律师事务所

本书版权登记号：图字：01-2006-5832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重获企业精神（原书第2版）／（美）吉尔德（Gilder, G.）著；林民旺，李翠英译. —北
京：机械工业出版社，2007.4

书名原文：Recapturing the Spirit of Enterprise

ISBN 978-7-111-20841-9

I. 重… II. ①吉… ②林… ③李… III. 企业管理 IV. F270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07）第013652号

机械工业出版社（北京市西城区百万庄大街22号 邮政编码 100037）

责任编辑：吴亚军 版式设计：刘永青

北京瑞德印刷有限公司印刷 新华书店北京发行所发行

2007年4月第1版第1次印刷

170mm×242mm · 17.25印张

定价：46.00元

凡购本书，如有缺页、倒页、脱页，由本社发行部调换

本社购书热线：（010）68326294

投稿热线：（010）88379007

译者序

读者手中的这本书是乔治·吉尔德的经典之作。它在初版的基础上，增加了四个章节的内容以及序言、结语，并且对部分内容做了适当的更新。与初版相比，这个修订版内容更加丰富，论述更加充分，可读性更强。

作为经济学供应学派的代表人物，同时也是20世纪90年代新经济最重要的倡导者之一——乔治·吉尔德，在本书中较为系统地论述了供应学派的经济思想。他认为，经济学家们钻进一大堆的经济数据中，将财富的增加看成是缓慢地向上增长的过程。而人们认为，可以通过工人边际生产率的提高与设备的缓慢更新实现财富的增长，并通过教育、培训和健康水平的提高使“人力资本”得到持续发展。但是事实上所有这些增长的途径，与企业家以新观念和新技术开办的新企业所起的作用相比，都是无法比拟的。经济增长的关键其实很简单：有创造力的人拥有了资金。经济停滞的原因也一样的简单：富于创造力的人的资金被剥夺了。为了扭转经济衰退，国家需要改变政策，唤起人们的创业激情，个人必须被允许积累可自由支配的资金，并可用于经济的发展中去。经济增长的关键是个人的财富，而不是企业或集体的财富。作者认为，经济思想中的一个根本性的错误是大大高估了物质资本形成和其他经济活动量化指标的重要性，严重低估了开创性创造所具有的决定性、根本性作用。盛行的资本主义理论犯了一个重大的错误：对资本家的完全不信任和缺乏理解。在作者看来，企业家的关键作用并不仅仅是填补现有市场或理论的缺口，而是产生一个全新的市场或理论。因为在资本主义下，财富不是一堆商品，而是一种观念流。资本主义的外表景象可能看上去是固定的、确定不变的，因而似乎也是可以捕捉到的，但是事实上它却是一种精神与观念。吉尔德大力批评“陈旧”的财富观以及对企业家创新的漠视。他高度赞扬企业家，认为给予是企业家精神的关键规则，

企业家所做的是经常回馈社会。而政府却常常以这样或那样的方式抑制了企业家的创新精神，为此他认为应该重视市场机制的作用，降低税率，刺激供给，减少政府对经济的干预。

本书具有很强的阅读价值，具有以下几个特点：

第一，本书语言通俗易懂，既非严格的学术性著作，也并非通俗类的文学作品。书中既有文学式的描述，又有颇具学术性的经济学观点的阐述。但是，却没有学术作品的晦涩、文学作品的夸张和辞藻的堆砌之感。不论是对企业家的热情讴歌，还是对美国政府的批评，文笔之中都饱含着激情。

第二，该书讲述了像辛普洛特等一大批企业家的创业和发展历程，故事生动而富有启发意义。对美、日、英等国家税收制度利弊的分析也是深入浅出，旁征博引，颇具说服力。

第三，该书视野开阔，内容庞杂。从企业家的创业到美国的经济政策、世界的经济形势，从房地产行业到半导体行业等，涉及面非常广。

在翻译过程中，上海译文出版社1992年出版的《企业之魂》（曾伟光、李海平、余谷、华仲乐译）给我们翻译本书提供了有益的帮助，弥补了我在专业知识、文笔修辞上的不足而可能导致的错误，同时也令我对前辈的翻译态度深表敬意，在此表示感谢。还要感谢北京外交学院朱杰进博士、刘慧博士以及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的熊祥，他们对译稿做了大量的校对工作。此外，感谢机械工业出版社华章分社的吴亚军编辑，如果没有他对该书的重视，该书也不可能以这种全新的面貌展现在读者面前。

林民旺

2007年1月

于外交学院

序 言

对乔治·吉尔德（George Gilder）来说，创业不仅仅代表着从事某项经济活动，而还是一种生活方式。同样地，创业是一种对自由和自治的追求，它鼓舞着人们大胆地开发新产品和服务，鼓舞人们全身心地投入自己的才能、精力和聪明才智来改善大众的物质福利，同时也引导人们从事其他社会工作。在该书呈现给读者的所有场景中，没有比迈阿密古巴移民的集体场景更让人惊叹的了。他们在仅仅30年内就创造了美国的一项奇迹，也就是使他们的新家园成为一个经济不断创新、充满活力的社区。而正是为了激励所有美国人，唤醒他们的创业精神，我们才出版此书，对此我们深感自豪。

从某种意义上说，吉尔德在该书中阐述的观点并不新颖。因为他只是汲取了历史上那些勇于大胆探索、自力更生的人们的智慧，他所表达的大部分观点都来自亚当·斯密（Adam Smith）的经济学思想以及该学科创始人的政治思想。然而当时美国正处于公众与无所作为的公私机构疏远了的时代，创业精神能够为公众以及他们所在的社区提供如何去面对关键的挑战——僵化的社会结构、环境危害、健康与安全问题以及对繁荣发展的威胁等方面的答案。

随着《重获企业精神》以及随后吉尔德的经典之作《财富与贫困》新版本的出版，当代研究所（ICS）将继续按照计划，倡导创业者的生活方式。通过美国最成功、最具影响力的倡导企业与市场的人的一系列阐述以及通过分析政策对创业活动的影响，ICS将继续分享并普及吉尔德等所巧妙阐明的这些理念。与其他国家相比，美国从充满活力的企业自由中获益最丰。ICS的目标就是希望重获企业自由的创业精神，并鼓励这种精神更强大地复兴。

小罗伯特 B. 霍金斯 (Robert B. Hawkins, Jr)

当代研究所所长

致 谢

1982年的一天，当时美国经济还深陷于衰退之中，我参加了一个经济学家会议，会上几乎所有人都预测美国经济将停滞或者崩溃。会议之后，我就返回在马萨诸塞州伯克希尔的家。在斯托克布雷（Stockbridge）的主干道上，碰到了我的一个朋友惠特莫尔·凯利（Whitmore Kelley），也叫尼克·凯利（Nick Kelley）。他曾跌跌撞撞地将他的小纸厂带进了计算机时代，由原来从事初级纸的切割与配制发展到为半导体行业绝对无尘室生产电刷和其他设备。他当时正面带笑容，我问他发生了什么好事，难道不知道一场大萧条将要来临吗？他说：“如果这就是大萧条的话，那就让它更萧条些吧。”因为对他来说，所谓“萧条”就是他的伯克希尔公司（Berkshire Corporation）的订单如此之多，以至于都无法完成任务了。

当时我就想到尼克·凯利的微笑就是一个经济繁荣的更好的重要指针，比我在经济学家会议上听到的被引用的所有数据都具说服力。在会上我就告诉大家，美国经济正处于一个企业大繁荣的时期，随后的几十年内将必定快速增长。然而经济学家们对我提供的风险资本和新经济的有利条件方面的数据完全不感兴趣。很明显，我认为美国正带领世界进入一个计算机技术的新时代，确实这就是绝对无尘室电刷（clean-room wiper）需求迅速增长的原因。但是杰出的经济学家们引用的是滞后的资本结构与萧条的生产能力的数据，因而美国经济就被描绘为创新能力日益下降的绝望状态。在我看来，经济学专家们不仅忽略了经济发展中创业精神的因素，而且也对此不感兴趣。然而，正如我在《财富与贫困》中所主张的一样，企业家们创造并管理着才是真正经济，而不是经济学家们所评估的那些数据。欧文·克里斯托尔（Irving Kristol）也一直持有此观点。与企业家的笑脸相比，经济学家们引用的大部分悲观的数据只是学术

界对这个小团体的未来悲观看法的反映。

我能够探索创新经济，并且出版此书，首先应该感谢我的邻居——国家半导体公司（National Semiconductor Corporation）的总裁彼得·斯普拉格（Peter Sprague）先生。正是他激起我对推动计算机时代发展的硅片（silicon chip）行业的兴趣。后来尼克·凯利（Nick Kelley）带我参加了该行业的达特奎斯特（Dataquest）会议，进一步增进了我的兴趣。虽然还有很多东西让我感到困惑，但是我所学到的东西足以让我肯定地认为，硅片行业的创新能力和技术风暴，必将成为美国经济未来的支柱。

此外，在并不知晓西维因（Sevin）和赖利（Riley）是何人的情况下，我参加了西维因—赖利的1万米长跑比赛，并且获得第4名。同时，西维因还成为了本书第14章（迈克朗公司的崛起）的主角，并且我在加利福尼亚的阳光山谷（Sunnyvale）的乔·赖利田径俱乐部（Joe Riley Decathlon Club）中进行了第13章（美国的数字革命）的部分研究。我当然知道斯普拉格和尼克·凯利二者都不是科学家或者工程师，但是他们却在西马萨诸塞山上的工作场地中发挥着关键作用。给我的印象是，这个行业与先前的所有行业不同，它更少受深奥的科学的推动，而更多的是由创业精神和企业精神所推动发展的。

这种想法的雏形最终成就了本书以及后来另一本关于半导体行业的著作。在写本书的时候，我得到了许多朋友的帮助。《福布斯》（*Forbes*）杂志的史蒂夫·福布斯（Steve Forbes）和詹姆斯·迈克尔（James Michaels）派我到博伊西（Boise）写有关迈克朗公司的传奇故事，正是在那里我发现了J. 理查德·辛普洛特同样有趣的故事。这两个故事构成了本书叙述的核心部分。《福布斯》杂志的劳伦斯·米纳德（Lawrence Minard）将材料进行调整修改，将之变成了第10章（20世纪90年代的财富）和新序言。在彼得·斯普拉格和恰萨·斯普拉格（Tjasa Sprague）夫妇的新年前夕的一个晚会上，我和恰萨的父亲米洛斯·科罗夫塔（Milos Krofta）比邻而座。他的创业故事成为本书的第5章“志在净化水的人”。我妻子尼尼斯（Nini's）的一位朋友邀请我们去佛罗里达的净水（Clearwater）海滩，希望我在那里就能够不用写作，而轻轻松松地娱乐。这位朋友的名字叫吉尼·德·阿莱霍·加西亚（Genie de Alejo Garcia），长得非常迷人，简直就是分散了我对佛罗里达古巴移民令人惊叹的故事的注意力。她及她朋友的传奇故事构成了本书的第6章“古巴移民的奇迹”（该章的西班牙文、英文和数据都是由我姐夫《纽约时报》的吉姆·布鲁克（Jim Brooke）加以修改

的）。他是一个通晓多门语言、能写能说的记者，当时他还在《迈阿密先驱报》（*Miami Herald*）工作。我最老的同时也是最风趣的朋友约翰·麦克劳里（John McClaughry）从白宫给我打来电话——他当时是总统顾问，告诉我应该见见韦恩·科普兰（Wayne Copeland），因为此人的创业传奇故事令人瞠目结舌。后来科普兰让我搭乘了他的佩刀客机（*Sabre Liner*），第7章“私人飞机里一颗忧伤的心”就是有关他的故事的梗概。时间流逝，他的企业发展越来越好。

加拿大亨特公司（Canadian Hunter）的约翰·马斯特斯（John Masters）将他的著作《探寻者》（*The Hunters*）（Evergreen Press, 1980）赠送一本给我。该书构成了本书第4章“探寻者”的基本内容。马斯特斯的书中包含尼克·莱昂（Nick Lyon）的《索尼的远见》（*The Sony Vision*）（Grown, 1976），从其中的一个访谈录中我获得了写作灵感。我是在一位英国企业家朋友丹尼斯·史蒂文森（Dennis Stevenson）的书架上发现该书的，并从他那里借来。该书与另一本同样给人深刻印象的书，即索尔·桑德斯（Sol Sanders）的《本田：人与机器》（*Honda: The Man and His Machines*）（Charles E. Tuttle Company, 1977）为我写第12章“日本企业家”提供了宝贵的材料。当时，我遇到了编辑乔治·哈里斯（George Harris）先生，他介绍我去看大卫·西尔弗（David Silver）和托马斯·法乔（Thomas J. Fatjo）的著作。正是这些著作丰富了我对企业家创业的自我牺牲精神的认识。正如一本书的写作可能偶然地源于生活，一个公司也同样可能来源于企业家的经验和灵感。

然而本书能最终呈现在读者面前最重要的并不是我找到或者访问了哪些人，而是得益于贝恩公司（Bain and Company）的赏识。我在丹佛（Denver）发言之后的一天，也就是去英国的前一天，该公司聘请我到波士顿（Boston）演讲。该公司人才济济，商业与经济方面的杰出专家很多，而我却似乎语焉不详。但是公司似乎并不介意，还邀请我回去了解它们在咨询贸易方面的经验。该公司的比尔·贝恩（Bill Bain）、科尔曼·安德鲁斯（Coleman Andrews）和其他人都成为了我的好朋友，并向我介绍了经验曲线（experience curve）。他们认为经验曲线是供应学派经济学的微观经济基础。我认为这么界定是正确的。其中第11章“增长曲线”以及本书的中心主题——将企业家创业活动与国家经济增长和进步相结合的关键就是经验曲线，皆来源于这个概念。

最后，我在查默斯·詹森（Chalmers Johnson）的《通产省与日本奇迹》（*MITI and the Japanese Miracle*）（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1982）中了解到，

日本经济快速发展的引擎石桥湛山（Tanzan Ishibashi）明显地支持了20世纪50年代早期的税收策略与价格削减政策，成为日本经济奇迹的关键之所在。拉弗学会（Laffer Associates）的查克·卡德莱克（Chuck Kadlec）、Polyconomics（新泽西州莫里斯敦城的政经智囊团）的艾伦·雷诺（Alan Reynolds）、美国商会的迪克·拉恩（Dick Rahn）都对这些方面做了进一步解释。

当然，写一本书并不是一时的灵感就可以完成的。原来的编辑欧文·格利克斯（Erwin Glikes）书桌上所堆积的一大堆手稿中大约有1/3都是本书的。正是他将本书推荐给西蒙-舒斯特公司（Simon and Schuster）出版的，同时在本书写作初期，他在思想上给予了我很多宝贵的支持。在审阅那一大堆书稿之时，他不幸犯了心脏病。完全恢复之后他又继续领导麦克米兰出版公司（Macmillan）下属的自由出版社（Free Press）。而那一堆书稿就转给另一位独立编辑米基·德克特（Midge Decter）了。德克特是一位一流的作家，同时也是我的朋友，我先前的两本书都是由她编辑的。在她给我提的建议中，最重要的一条就是将那一大堆书稿分成两本书来出版。一本就是你们现在看到的这本书。另一本是对半导体技术发展的历史与分析，已于1989年由西蒙-舒斯特公司出版，书名是《微观世界》（*Microcosm*）。

后来，本书又转给编辑鲍勃·阿萨希纳（Bob Asahina）。她又逐章地进行了修改编排，才形成了现在这个样子。但是本书的任何错误都由我本人承担。

我还想对当代研究所出版社的鲍勃·霍金斯（Bob Hawkins）和罗伯特·戴维斯（Robert Davis）表示感谢，正是他们使该书获得新生。同时还要谢谢彼得·海斯（Peter Hayes），他对本书20世纪90年代之后的新材料、新章节（包括第1、8、10、13章）的内容提出了大胆、深刻的见解。

乔治·吉尔德
于马萨诸塞州杜林哈姆

目 录

译者序

序言

致谢

001

George
Gilder

第一部分

英雄的经济

第1章 企业之谜/2

第2章 一片沙地/11

第3章 真正的经济/29

第4章 探寻者/42

第5章 志在净化水的人/56

第6章 古巴移民的奇迹/75

093

George
Gilder

第二部分

企业家的安乐死

第7章 私人飞机里一颗忧伤的心/94

第8章 外来者的贸易丑闻/108

第9章 没有资本家的资本主义/116

第10章 20世纪90年代的财富/132



第三部分

大转型

- 第11章 增长曲线/146
- 第12章 日本企业家/169
- 第13章 美国数字革命/194
- 第14章 迈克朗公司的崛起/209
- 第15章 创业的动力/234
- 结语/246
- 注释/250



第一部分

英雄的 经济



第1章

企业之谜

编·辑·笔·记

资本分配的80/20原则看似不公平，实际上却揭示了企业家的创业之谜。在自律和奋斗中，企业家在向人们提供生活必需品与服务的同时也在不断地积累和扩大自己的财富。为了经营这些财富，他们付出了毕生的精力和热情。一旦他们开始关心自我消费而放弃企业经营，那么财富就会迅速贬值。这也是驱使企业家不断奋斗和创新的动力。因此，精神和信仰才是企业家的生产方式。他们的“冒险经营”将带领着企业不断地进入新的领域，从而创造更美好的未来。

为了保持和激励这种信仰，政府需要鼓励和支持企业家的自主创业精神，这才是一个国家财富保有并增值的秘密所在。

美国企业家与40亿穷人共同生活在一个世界上。这些脆弱的人们仅仅掌握着一点政治权力和防卫手段。民主国家的人民或者军人集团能够任意夺取他们的财产。为什么在遍布饥荒、贫困和疾病的地球上，却有少数人能够控制的财富足以是他们生存与享受需求的成千上万倍？为什么少数几千个家族所拥有的财富能够远远超过了大部分国家的财富。

更具体地说，为什么媒体大亨威廉·克卢格（William Kluge）拥有70亿美

元的财富，而社会工作者苏西·圣特林（Suzie Saintly）一年却只能挣15 000美元？或者说为什么哈里·赫尔姆斯利（Harry Helmsley）支配着10亿美元的资产，而哈里·霍姆利斯（Harry Homeless）却只能以蒸汽炉边的破毡子为生？为什么微软总裁比尔·盖茨（Bill Gates）身价高达70多亿美元，而最早的用于个人计算机的电子表格软件visicalc spreadsheet的发明者丹·布里克林（Dan Bricklin）却仍然才雇用一个工人在远离家乡的地方工作着？为什么迈克尔·米尔肯（Michael Milken）能够控制几十亿美元的资金流，而美国总统一年却只能挣取200 000美元的工资？

这些是否都是合情合理的呢？

从统计数据上看，出现的问题的确令人吃惊。为什么1%的最上层家庭拥有整个国家财富的20%，而最下层的20%家庭却深陷债务之中，所占净值份额微小到根本就不用测量。

在全球层次上，贫富不均表现出的情况就更是极端。为什么甚至美国最下层5%的人扔掉了足够养活一个大洲人口的食物，而100多万的埃塞俄比亚（Ethiopian）人却死于饥荒。为什么美国的狗和猫吃的食物却比这个不公平的地球上的中等居民还好得多？

我们都知道生活是不公平的，然而对于许多人来说，这种巨大的差距却是多么可笑啊！因为它看上去是多么不合情理、不恰当啊！很明显，这种差距既不与他们的需求、美德或者智商相一致，也不与他们的信用、教育水平、社会贡献成比例。

现在大部分观察家都承认资本主义能创造出经济繁荣。然而似乎富人的形象却是对资本主义的一种讽刺。例如，让我们掩着鼻子来看看美国富翁前400名的《福布斯》排名吧！他们之中的许多人都是身材矮小、尖嘴猴腮、脾气暴躁、满脸斑点，而且一副肥肥胖胖的蠢样。他们中至少有10个人中学都没有毕业，而其中上了大学的304个人中仅有240人顺利毕业。一个社会能够容忍依靠丰功伟绩取得贵族地位，而资本主义却毫无意义地偏爱这些奇怪的“乌合之众”。

那么，我们是否能够创造一个没有这些富豪的资本主义体系呢？是否可能创造出如资本主义一样繁荣的经济，同时却能够实现更加公正合理的财富分配呢？

倘若富有企业家的财富额被限定在1 500万美元以下，是否世界会变得更加美好呢？显然，山姆·沃尔顿（Sam Walton）的后嗣，或者哈里·赫尔姆斯利和利昂娜·赫尔姆斯利（Leona Helmsley）的后代们每年收入大约在100万美元时也能够生活下去，因为这种收入水平已经是美国总统薪水的四五倍了。

对此，大部分资本主义的拥护者说不。他们认为，我们所看到的这种奇怪的不公平正是创造财富不可缺少的过程的反映。他们暗示从道义或者理性上看资本主义是难以理解的，然而它却能创造财富。因而，他们认为，不要对它过于挑剔。

通常反对资本主义的一个理由就是认为贪欲可能驱使利昂娜·赫尔姆斯利或者伊凡·博伊斯凯（Ivan Boesky）的行为触犯法律。但是如此说来，贪欲也能使整个资本主义体系运转起来。由于贪欲在美国比埃塞尔比亚更少受到束缚，因此以蒸汽炉边的破毡子为生的哈里就比亚的斯亚贝巴（Addis Ababa）的中产阶级吃得还好。

这实质上就是亚当·斯密（Adam Smith）的观点。作为第一个且现在仍然是最经常被引证为资本主义辩护者的亚当·斯密断言正是来自企业家的“奢侈与怪想（caprice）”以及他们对“经济大厦细枝末节的方方面面”的期望，才使穷人获得生活的必需品，而从他们的仁慈与公正中，穷人将一无所获。

在斯密可能最著名的几段文字中，他写道，企业家：

尽管他们天性自私贪婪，只想着自己的好处，他们对雇用的成千上万的劳工的唯一目的就是获得无止境的报酬和填补自己永不满足的欲望……他们被无形的手引导着……没有想着实现这样的结果，也不知道这一点，然而却提高了社会的利益。

资本主义最伟大的辩护者就是这样描写他那个时代的富人。然而新近的经济学家们，从约翰·肯尼思·加尔布雷思（John Kenneth Galbraith）到罗伯特·库特纳（Robert Kuttner），都提到富人们沉溺于追求财富的同时却潜在地阻碍穷人获得生活必需品。

其实，美国企业家并不比哈里·霍姆利斯或者苏西·圣特林更贪婪。即便不与他们休闲的机会相比，人们也能看到他们是工作狂。按照他们拥有的或者生产出来的东西以及他们对人类的贡献，他们自身消费的量，根据比例来看，比世界历史上的任何其他团体都要少。

美国主要的企业家，除了一些不太典型的之外，非但不贪婪，反而遵守纪律、克己自制，工作努力而又生活节俭，远远超过了学界人士、华盛顿思想库或主教教徒。当然，他们是一些奇怪的“乌合之众”，因为他们的成功不是来自于血统、资格证书、教育或者他们对商业机构的服务，而仅仅是源于他们的成就与表现，源于他们为消费者提供的服务。

贪婪是一种追求非必需的、不劳而获的财富与权力的欲望。真正的贪婪首

先寻求的是舒适与安逸，寻求他们没法挣到的好处和影响力。由于获得不劳而获的报酬最好的办法就是通过国家从他人手上取得，因而正如被一只无形的手引导着一样，贪婪导致更大程度上的政府行为。

一般来说，富人们依靠对共同的福利所做的贡献而挣得了远远超过他们收入的金钱，或者他们是从前辈继承下来了财产，而他们的前辈也是这么做的。而且，大部分企业家继续着他们的工作，使世界更加富有。

事实上，与哈里·霍姆利斯相比，贪婪更不是比尔·盖茨的特性。虽然哈里看上去很可怜，然而他和他的拥护者坚持认为，他们拥有并且将这个星球上最珍贵的土地贬值了。从圣莫尼卡（Santa Monica）的海滩到曼哈顿（Manhattan）中心，他想居住的条件比整个人类历史中的大部分人都要好，然而他却不想回报维持他生存的社会以任何东西。他想要的才是十足的不劳而获的财富。这就是贪婪的本质。美国企业家与那些依靠政府窃取财富并在宫殿里与太监们狂欢作乐的封建国王是绝不相同的。一般而言，美国富人并不满意于自己的财富，因为它们中的大部分并不是流动资产，却是以投资的形式被用于他处，表现为巨大的企业网，而这些企业如果要想保持自己的财富就只有通过不断的运作与贡献。

比尔·盖茨及其他大部分人都一样生活节制，对自己及其工作方面的投入却毫不吝惜。他们将利润都重新投资在生产性企业里，这样雇用了工人，也使世界变得更加富有。

400人与40亿人之间巨大差距的原因并不是企业家工作努力或者工作更好，或者放弃更多消费。不承认对400人从事贪婪狂欢的指控，我们就无法解释他们巨大财富的真正原因。

自亚当·斯密以来，人们提出很多理论以解释资本主义导致不公正的原因。权利论认为，巨额财富创造者们有权利拥有这些财产。但是声称有权利拥有成千上万人创造出来的巨额财富，并有权利受到国家保护的这种言论只是以更加抽象的语言重复了不公正之谜。

于是，又有胡萝卜加大棒论（argument of carrots and sticks）认为，山姆·沃尔顿几十亿的财产给他提供了向南部扩张，开办商铺的必要动机。而穷人哈里的状况也给其他人提供了一个警戒性的信息：应该努力工作，服从命令。但是批评者似乎能够合理地回答道：“当然，我们都需要动机……但是没有70亿美元资金啊？”结果，一些辩护者将会说，山姆几十亿的资金是他杰出的经营能力的回报，而贫困恰恰是目光短浅、生活无度的结果。而苏西·圣特林、丹·布里克林和乔治·布什（George Bush）既不是目光短浅，也不一定就比山姆稍逊一筹。